

•CHONG QING KANG ZHAN CONG SHU•

抗战时期 重庆的防空



重庆抗战丛书

胡德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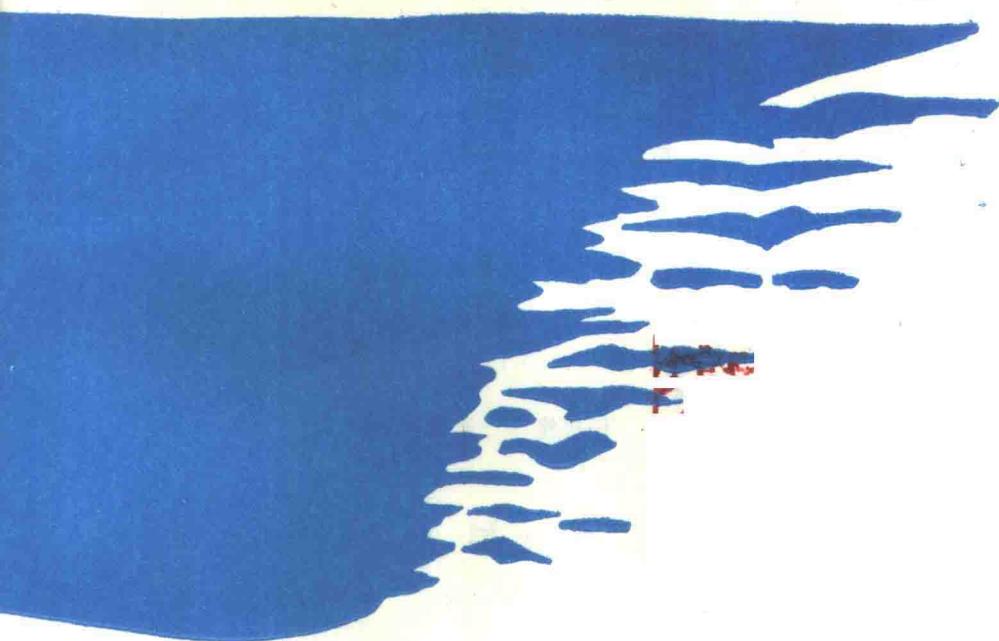


重庆抗战丛书编纂委员会 编
重庆出版社

抗战时期重庆的防空

重庆抗战丛书

胡德署



重庆抗战丛书编纂委员会 编
重庆出版社

(川)新登字010号

责任编辑 杨亚平
封面设计 徐赞兴
技术设计 费晓瑜

唐守荣 主编
抗战时期重庆的防空
(重庆抗战丛书)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新华书店经 销 重庆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6.5插页4字数 155千
1995年8月第一版 1995年8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000

*

ISBN 7-5366-3128-6/E·13

定价：9.25元

出版说明

一、为隆重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客观地总结历史经验，为统一祖国、振兴中华和振兴重庆服务，特编纂出版《重庆抗战丛书》(下简称《丛书》)。

二、《丛书》属学术性著作。它立足陪都重庆史实，联系全国抗战形势，对重庆抗战的历史进行比较全面、系统、深层次的研究，融学术性、资料性、知识性、可读性为一体，既可供史学工作者特别是抗日战争史研究者参阅，又面向社会，供广大读者和海外有兴趣的人士阅读。

三、《丛书》包括重庆国民政府、中共中央南方局与八路军驻渝办事处、国民参政会、重庆人民对抗战的贡献、抗战时期重庆的经济、军事、兵器工业、防空、科技、教育、文化、新闻、对外交往以及陪都人物、陪都遗址和大事记等16本专著。

四、《丛书》的年代断限，起于1937年7月全面抗战开始，止于1945年9月抗战胜利。某些内在联系十分紧密的史实，可适当将时限前展或后延。

五、《丛书》的开本为大32开，数字用法参照《关于出版物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执行，注释一律采用脚注。

六、《丛书》的编写出版得到了中共重庆市委员会、重庆市人民政府、政协重庆市委员会和重庆出版社、西南师范大学、重庆师范学院、重庆社会科学院、重庆市地方志总编室、中共重庆市

委党史研究室、重庆市档案馆、重庆市博物馆、重庆图书馆、红岩革命纪念馆、《重庆日报》社、西南兵工局、重庆市地方史研究会、重庆市历史学会等单位领导的大力支持。参加本书的编写人员主要是上述单位所属的教学、科研人员与专业干部。因此，本丛书是集体劳动的结晶，共襄盛举的成果。

序

《重庆抗战丛书》是重庆市政协牵头编纂的一套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的书。这项工作很有意义。据我所知，最近一个时间里，其他地区、单位也将有一批抗日战争的专著和资料出版。其中《丛书》并且不止一部。在抗日战争过去50周年之际，人们对这段历史的研究正在掀起一个热潮。

抗日战争所以需要研究，理由不止一端。最根本的原因是这段历史在中国近代史上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我们只须稍微回顾一下过去，事情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了。历史常有巧合，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正值中日甲午战争100周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失败，进一步陷入了半殖民地、殖民地的黑暗深渊，不能自拔。1895年甲午战争结束到1937年抗日战争，共42年。那中间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它们都没有给中国找到出路。1919年“五四”运动到抗日战争，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又进行了17年，屡起屡仆。日本军国主义却在这个时间里占领了中国东北，制造出伪“满洲国”，并进而分裂华北。中国真正临到了危急存亡之秋。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就是在这个严重形势下爆发的。八年抗战的过程是中国历史发生巨变的过程。在那以后四个春秋，中国人民一举取得了民主革命的最后胜利。紧接着又跨越了社会主义改造的大关。时代接连不断地迅速改变面貌，令人目不暇接。现在我们已经在社会主义道路上走过了40多年。回顾甲午

战争以来100年的中国历史，我们发现8年抗日战争是近代中国历史转折的一个关键。研究这段历史，我们不仅看到了中华民族遭受的深伤巨痛，累累血污，也看到了它的倔强挺立高大的灵魂；不仅看到了旧中国如何死死拖住历史前进的后腿不放，也看到了历史如何促使人们觉醒，加速把旧中国变为一个新中国。

重庆在抗日战争中政治环境独特。它是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所在地，又是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驻渝办事处所在地。第二次国共合作奠定了中国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基础，而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相当一部分活动则是在重庆进行与展开的，其中包括毛泽东同蒋介石的会面和谈判。抗战期间，重庆本身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也有研究整理出来，供人了解的价值。谈论抗日战争，少不了要讲重庆的种种活动，就像少不了要讲延安的种种活动一样。历史给予了这两城市极大的光荣。《重庆抗战丛书》一系列研究专题和资料，涉及不少领域，具有特色。人们应该可以从中找到所需要的东西，去认识抗日战争特定的历史地位以及它怎样为后来新中国的降临作了准备。

抗日战争把全国空前未有地动员起来了。许多地区，不分前线与后方，都可能有这样那样的史实值得笔之于书。有了它们，就有了我们全民族这场惊天动地的、为生存而斗争的全貌。《重庆抗战丛书》带了一个好头。希望它是我们看到的以地区命名的第一部大型历史书，而不是这方面仅有的一部书。

刘大年

1993年5月4日

《重庆抗战丛书》编委会

顾问 黄 治

主任 张文彬

副主任 (按姓氏笔画为序)

邓中文 刘崑水 李书敏 杨光彦 耿 聰

陶维全 徐朝鉴 蒋际华

委员 (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明湘 文履平 刘豫川 冯玉荣 李宗杰

杨从荣 陆大钺 陈贤义 罗传勤 周永林

黄长军 彭伯通 蒲华清

《重庆抗战丛书》编辑室

主编 徐朝鉴

副主编 李宗杰

编辑 陶才祯 杨耀健 王建西

本书编写人员

主编 唐守荣

编写人员 唐守荣 刘支全 荀翠屏 潘 润

目 录

出版说明	1
序	1
第一章 日本侵华策略的改变	1
一、日本侵华方针的新变化	1
二、重庆是日机轰炸的主要目标	6
三、日军轰炸重庆的战略部署	11
第二章 日机对重庆狂轰滥炸	18
一、1938年日机对重庆的轰炸	18
二、1939年日机对重庆的轰炸	21
三、1940年日军的“101号作战”	32
四、1941年日机对重庆的轰炸	50
五、1942年日军的“5号作战”计划	60

第三章 重庆国民政府的反空袭斗争	67
一、防空机构的建立与改组	67
二、防空教育与市民疏散	73
三、改进防空措施与对策	83
四、防空作战指导与部署	97
五、防空部队与空战	103
第四章 重庆国民政府的防空赈济	120
一、赈济机构的建立	120
二、防空赈济工作的开展	127
三、防空赈济工作的历史作用	133
第五章 重庆各界人士的防空斗争	139
一、各界舆论对日机轰炸的谴责	139
二、抢险救灾服务与支持防空建设	152
三、坚守岗位，支援抗战	160
第六章 重庆防空斗争的地位和作用	174
一、坚持抗战的象征	174
二、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	182
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	188
后记	196

第一章

日本侵华策略的 改 变

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日本在坚持灭亡中国的总方针下，在对华策略上改变了以往对国民党及其政府实行军事进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的方针，而实行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

日本在策略上的新修改，并不意味着它对国民党军事压力的放松。它凭借其空中优势，选择了对以重庆为主要目标的中国城市进行轰炸的战略手段。日本多次发布指令，命令陆海军航空部队以狂轰滥炸打击中国政治、军事中枢，妄图以此摧毁陪都人民的抗战意志，迫使国民政府投降，达到“迅速结束中国事变”、灭亡中国的目的。由于国民政府和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反轰炸斗争，日本的这一残暴阴谋始终未能得逞。

一、日本侵华方针的新变化

〔日本速决亡华计划的破产〕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战争之初，日军作战部门中盛行着“对华一击论”，认为只要大军一出，就可以速决亡华。特别是他们轻取平津以后，被暂时胜利冲昏了头脑，以为中国丧失了长期抗战的自信，遂制订了扩大侵略战争的计划，把矛头指向中国经济、政治中心——上海、南京。日本陆相杉山元报奏天皇说，只要大日本皇军陈兵沪、宁，“中国政府和中国军队的生存就不能超过三个月。”狂妄地认为3个月就可以摧毁中国的全部抵抗力量。但是，战争的进程没按侵略者的意愿发展。侵华战争从发动的那天起，就遭到了中国人民的坚决抵抗。仅淞沪一战，中国军队就坚持了3个月之久，日本付出死伤5万多人的沉重代价才占了上海。日军3个月灭华的梦想遭到了可耻的破产。

日军占领中国首都南京后，欣喜若狂，以为这是“中国事变”的终点。1938年1月，日本发出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政府声明，企图扶植傀儡政权，“以华治华”。但是，南京虽然陷落，中国政府并没有屈服，国民政府宣布迁都重庆，继续抵抗，战争已愈显长期化趋势，日本当局也感到要征服中国确实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同年6月，在日军占领徐州后，日本五相会议认为：“中国事变虽因徐州陷落，已见战局之一大进展，唯其前途尚辽辽。”^①因此，日本政府决定“集中国力直接解决中国事变，大概以本年内达到战争的目的。”^②日本军部倾其主力，集中侵华部队的陆、海、空军向华中、华南大举进攻，把赌注下在攻占武汉、广州等地上，以期在1938年内结束战争。

①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编：《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译稿）第2卷1分册第94页。

②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编：《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译稿）第2卷1分册第94页。

1938年10月，日军攻占武汉、广州。经过15个月多的激战，日军虽然先后占领了上海、南京、武汉、广州等大城市以及东部沿海地区和平汉、粤汉铁路以东部分地区，但是，中国的抵抗能力并未被摧毁，中国人民的抗战意志更加坚强。正面战场的中国军队是主动撤离武汉的，100多万中国正规军队驻扎在武汉外围的鄂、皖、豫、赣之主要地区。武汉的东南边有第三战区的22个步兵师、两个步兵旅和其他特种部队；东北边是第五战区的26个步兵师、一个骑兵师和其他特种部队；南边有第九战区的52个步兵师以及特种部队和游击队。国民政府的抗战意志也没有动摇。在武汉失守后两天，10月28日，蒋介石发表《告全国国民书》，表示了坚持抗战的决心。而且，他指出，武汉保卫战之目的在于：

“阻滞敌军西进，消耗敌军实力，准备后方交通，运积必要武器，迁移我东南与中部之工业，以进行西南西北之建设。又说，我中部工业及东南之人力物力，已移植于西部诸省，西部之开发与交通建设，已具初步基础。”①

武汉保卫战振奋了民族自信心，锻炼了军队的攻防能力，又有以“天府之国”四川省为首的西南西北潜力无限的后方基地作依托，为长期抗战打下了基础。

同时，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游击战争猛烈开展，到1938年10月，八路军和新四军同日军作战1600余次，毙伤俘敌5.4万余人；八路军发展到15万多人，新四军发展到2万多人，先后创立了华北的晋察冀，西北和大青山、晋冀豫、鲁西南、冀鲁边、山东，

① 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编印：《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稿——对日抗战时期》第2编，作战经过（二）第351页。

华中的苏南、皖中、豫东等抗日根据地。11月，八路军三大主力又由原山西山区分别向河北和山东平原地区挺进，在冀南、冀中、冀鲁豫边区和山东等地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敌后抗日根据地出现了新的局面。敌后游击战争的发展和抗日根据地的扩大，消耗和牵制着日本大量兵力，并同正面战场相配合形成对日军的夹击态势，对侵略者构成日益严重的威胁。这种情形使日本最高军政当局也不得不承认“汉口之陷落并非事变之终点。”因此，在发出《关于攻陷武汉后国民活动的通知》中提出：“要避免召开使人感到事变结束的战胜庆祝会”，而是要“宣扬应付新阶段的精神准备。”^①事实上，一年多的战争大量地消耗了日本的军事力量，到1938年底，日本在中国战场上已陆续投入了23个师团、16个旅团（不含东北的关东军），共计近百万人的兵力，占其陆军总数的2/3以上，在日本本土只剩下近卫师团了，战争中伤亡已达44.7万多人。随着战局的扩大，战线的延长，保守占领地的兵力又大量增加，日本当局感到“以抗战情绪日益旺盛的中华民族为对手，在辽阔无垠的大陆上，以派遣军的有限兵力，欲期急速结束事变，几乎认为是不可能的事了。”^②日本国内的经济形势也出现困难，连日本军方也认识到：“如再扩大战区或增派兵力，无疑要大量消耗国力”，随时可能“陷入因暂时的财政破产而不得不改变对华方针的窘境。”^③这样，日本帝国主义在坚持灭亡中国的基本国策的前提下，不得不对侵华政策作一些调整。

〔软硬兼施的侵华新方针〕

日军大本营早在进攻武汉以前就对占领武汉后的对华政策作

①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编：《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译稿）第2卷2分册第35页。

② 《今井武夫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123页。

③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编：《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译稿）第2卷1分册第96～97页。

了两手准备。1938年7月8日，日本五相会议作出决定，对华中、华南积极进攻，“让敌人连战皆败，特别是中原地区的陷落，将引起中国中央政府自行崩溃和放弃继续抵抗的意志。”重庆国民政府屈服时，“帝国将其作为一个政权……使其合并于新兴中国中央政权(傀儡政权——笔者注)之下”，若“仍不投降时，帝国今后不用直接急于用武力解决事变，主要运用政策和策略更加促进新中央政权的扩大和加强。同时，在政治、外交、经济、思想上逐渐压迫中国现中央政府，促使中国现在的中央政府毁灭。”^①在此已显露出日本帝国主义在占领武汉后改变原来对国民党政府及军队采取的以军事打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政策的端倪。占领武汉后，日本当局深感结束“中国事变”前途难料，继续进攻重庆又力不从心，便进一步确定了对国民党政府进行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

同年11月3日，日本政府发表《东亚新秩序声明》(第二次“近卫声明”——笔者注)，声称“如果国民政府抛弃以前的一贯政策，更换人事组织，取得新生的成果，参加新秩序的建设，我方并不予以拒绝。”^② 明确否定了第一次“近卫声明”中提出的“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方针，以共同反共防共为诱饵，对国民政府进行分化、诱降，要国民党放弃抗日容共政策。日本帝国主义华中派遣军认为，战争进行到目前的形势下“进行攻略尤其是谋略的重要性更加大了。”^③ 1938年12月6日，陆军省制定的“对华处理方略”明确规定，占领武汉、广州以后，“应以恢复治安为根本”，“消灭残存抗日势力的工作虽应继续进行，但主要应以武力为背景结合

①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编：《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译稿)第2卷10分册第96～97页。

②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编：《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译稿)第2卷2分册第68页。

③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编：《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译稿)第2卷2分册第54页。

运用谋略和政略。”^①同月，日本政府设立“兴亚院”，由内阁首相兼任总裁，统一筹划对华政治、经济、文化侵略事务。日本政府企图用“政略”、“谋略”以及外交各种手段引诱国民党投降反共，促进国民政府的屈服，从而达到“以华制华”的目的。

与政治策略变化相适应，军事上，日本侵略者停止从陆地上对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采取以保守占领区和切断我国西南、西北两条国际交通线为主的方计，逐渐将其主要兵力用于敌后战场，重点打击八路军和新四军。但是，为了配合政治上的诱降活动和继续打击国民政府的抗战决心，加强了对我国大后方的战略、政略轰炸。

1938年11月，日本陆军部制定的《陆军作战指导纲要》中提出：“要确保占领地，注意避免战局的扩大，但要积极进行航空作战，特别要在制压敌人的战略、政略中心的同时，尽力消灭敌人航空战斗力量。”^② 12月2日，日本天皇向侵华日军下达对重庆实施战略轰炸的“大陆令第241号”。敕令称“大本营的意图在于确保占据地区，促进安定，以坚强的长期围攻态势，争取压制消灭残存的抗日势力。”命令“华中派遣军司令官主要担任华中及华北的制空进攻战，特别要压制和扰乱敌之战略及政略中心。”从此，日军航空部队的作战重点由以前的协助地面部队改变为直接攻击中国大后方战略、政略要地，尤其是国民政府战时驻地——重庆。

二、重庆是日机轰炸的主要目标

〔国民政府移驻重庆〕

四川古称“天府”，山川雄伟，民物丰殷。重庆位于“天府之

① 《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上)，四川人民出版社第459页。

②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编：《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译稿)第2卷2分册第69页。

国”中，是一座有悠久历史的文化名城，为国家重镇。它地处长江，嘉陵江汇合处，其东、南、北三面有大巴山、巫山及云贵高原的大娄山环绕，又有长江三峡的急流险滩扼守东部门户。因此，重庆素有“天险”之称。乾隆简志云：“全蜀四塞之险，甲于天下。故渝城能守，坐安和会。”近代以来，重庆发展成为西南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和经济中心，与西南各省联系密切，为西南物资集散地，加之物产丰富，水陆交通较为便利，具备了长期坚持抵御外敌的有利条件。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大举进攻中国。8月13日，上海战事发生；14日，国民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中国绝不放弃领土之任何部分”，“遇有侵略，唯有实行天赋之自卫权以应付之。”接着，又成立了战时最高指挥机关国防会议，颁发了总动员令，在全国范围开始了抵抗日本侵略的民族解放战争。

10月29日，在淞沪战场中国军队处于不利的形势下，国防最高会议举行会议，蒋介石在会上作了题为《国府迁渝与抗战前途》的讲话，确定以四川为抗日战争的大后方，以重庆为国民政府驻地。会议接受蒋介石提议，正式决定国民政府西迁重庆。次日，国民政府接受国防最高会议的决定。11月20日，国民政府发布《移驻重庆宣言》，宣布国民政府“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起见，本日移驻重庆。此后将以最广大之规模，从事更持久的战斗。”“继续抗战，必能达到维护国家民族生存独立之目的。”^①11月中旬，国民政府已着手部署迁驻重庆的工作。11月16日晚，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乘舰西上，首批抵渝。12月1日，国民政府开始在重庆办公。随后，政府各院、部、会陆续迁至重庆。1938年

^① 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编印：《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2编，作战经过（二）第211～212页。